

意义的意义*

——兼论语篇意义的分析单位

殷祯岑

(上海师范大学教育学院, 上海 200234)

提 要 意义的研究亟需深化、拓展,而意义概念的混沌不清极大地阻碍了这一进展。本文从哲学、符号学、语言学的学科角度梳理学术语境中的意义观,勾勒多学科视野中的意义概念图景。研究发现,当代学术语境倾向于语篇视角的意义分析,语篇的意义包括客观事件和主观评价两方面。符号序列只有同时表征了两者,它承载的意义才是完整的。同时,意义的在线生成性、环境规约性、发展流变性、主观建构性特征也因此得到强调。据此,语篇视角的意义分析大有可为,而这一分析路径的开辟首要设立适合意义分析的语篇单位。本文结合意义的概念图景得出结论:语篇中承载完整意义(事件+评价)的符号序列即为语篇意义的分析单位。

关键词 语言的意义 客观事件 主观评价 语篇意义 符号序列 语篇意义的分析单位

DOI:10.16027/j.cnki.cn31-2043/h.2017.06.005

“意义”几乎涉及人类生活的全部领域。格雷马斯说:“人类世界本质上可定义为意义的世界……只有在探寻意义的活动中,诸人文科学才能找到它们的共同点……以多少有点明晰的方式给自己提出人和世界意味着什么的问题”(格雷马斯 2001:1)。但是,由于我们就生活在意义中,对意义的探寻反而成为一件十分艰难的事情。正如利奇所说,人类对意义的思考纵贯了整个人类思想史,但“没有任何作者能够企图综观语义学领域,如果他勉为其难也将只能达到表面上概述他人关于意义的思考而已”(利奇 1978:10)。

正因如此,虽然意义是语言的核心,主流语言学界却长期回避意义问题。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随着功能语言学派的崛起,意义得到较为充分的关注。但是正如韩礼德所说:“意义系统的动态模式至今还没有很好地制定,这是语言理论家现在必须解决的问题之一”(朱永生、严世清 2001:15)。语言的意义长期得不到系统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我们尚未弄清什么是意义。有鉴于此,本文致力于梳理学术语境中的意义观,并以此为基础,尝试提取意义概念,设置语言意义的分析单位,帮助深化语言的意义研究。

一般来说,对语言的意义探讨得最为集中,也最有成就的当属哲学、符号学和语言学。

*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汉语语篇的语义分层与言者主体介入研究”(项目编号:17CYY033)研究成果。

一、哲学视野中的意义

人类对“意义”的关注始于哲学。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语言学转向更是使意义研究成为“20世纪盎格鲁—撒克逊和奥地利哲学家们的一种职业病”(Ryle 1963:128)。但是,经过了整个世纪的努力,“意义这个词和它对应的意指仍是英语中争议最多的术语之一”(利奇 1978:10)。概括而言,哲学的意义观主要有:

1.指称论

指称论认为语言的意义是它指称的外部世界。这一思想源于古希腊,在柏拉图、亚里斯多德的著述中多有论及。在分析哲学阶段,罗素、弗雷格、维特根斯坦(前期)等持此观点。分析哲学家希望通过对语言进行逻辑分析和构建人工语言发现隐藏在语言中的稳定逻辑形式,取代形而上学的思维模式。他们将语言的意义视为语言形式对外部世界的指称,如分析哲学的开创者之一弗雷格就说:“如果一个符号系统不能确定地表达‘指称’,或者说,它们所传达的指称容易引起歧义、需要人们去猜测的话,那么这个符号系统肯定不是一个好的表达系统。”(转自张妮妮 2008:20)前期维特根斯坦也持意义的指称论,认为语言是关于世界的图像,语言的命题描述世界的事实。针对现实中是否存在不可言说的东西,维特根斯坦说:“的确存在不可言说的东西”,而“对不可说的东西我们必须保持沉默。”(陈嘉映 2003:148)

指称论肇源于古希腊,本是最朴素的意义观。但分析哲学时期的指称论是在分析语言逻辑、建构人工语言的目的下展开的。这里的指称,比起自然语言,更强调符合逻辑要求的理想语言或人工语言与外部世界的一一对应。

2.观念论

观念论主张:语词的意义是它所代表的观念和意象。其鼻祖洛克(Locke)说:“语词无非是代表其使用者头脑里的观念……他用自己的观念来向自己表现别人的观念时,即使他愿意给这些观念以别人通常所用的名字,他其实仍然在为自己的观念命名。”(洛克 2009:386-387)休谟也是观念论的代表。他把心智的对象分为印象和观念。印象是通过感性思维达及的心智对象,观念是通过理性思维(如推理)达及的心智对象。语词的意义与观念对应,因此它指涉经验主体的心理对象,而不再直接对应于外界事实。

观念论是对指称论的发展和修正,它打破了语言与外界直接对应的镜像关系,突显了作为主体的人在意义形成中的重要价值。但人的心理观念如何影响意义,观念论并没有说明。

3.行为论

鉴于意义概念的复杂多歧,行为论者希望给意义一个明确可观察的标准,他们将意义界定为交际中由语言引起的“公共地可观察的人的行为”。蒯因、布龙菲尔德等持这一观点。

行为论认为人类思维遵循“刺激-反应”模式,因此考察公共可观察的行为是研究人类思维的可靠途径。布龙菲尔德说:意义就是“说话人发出语言形式时所处的情境和这个形式在听话人那里引起的反应”(布龙菲尔德 2009:166)。

行为论的初衷是简便、直观地把握意义,但这样的处理无疑过分简化了意义。蒯因曾试图

用“行为倾向”替代“行为”,以缓解行为论的机械性。但“行为倾向”一方面并未真正跳出“刺激-反应”模式,另一方面又由于不再具有“公共可观察性”,反而丧失了直观优势。

4. 实证论 & 真值条件论

早期语言哲学家为了从语言中探索新的逻辑体系,提出句子的意义在于它如何被证实。这就是意义的实证论。前期维特根斯坦、石里克、卡尔纳普等坚持这一观点。

前期维特根斯坦总体上坚持指称论,但他同时开启了实证论的先河。他说:“有意义的命题陈述某件事,它的证明表明是如此的。”(转自刘龙根 2004:51)在他的影响下,石里克(Schlick)说:“陈述句子的意义,就等于陈述使用这个句子的规则……一个命题的意义,就是证实它的方法。”(崔伟艳 2010)卡尔纳普(Carnap)则更进一步:“当且仅当一个语句是可以证实的时候,它才是有意义的,而它的意义即是它的证实方法。”(转自洪谦 1982:40)

至此,意义的证实已不仅是判断真假,还发展出寻找句子在什么条件下为真的新向度,这就是真值条件论。塔尔斯基和戴维森代表了这一观点。塔尔斯基(Tarski)提出 T 等式:“(T)X 是真的,当且仅当 p”:一个语句是真的,当且仅当它被所有对象满足;反之,该语句为假。如“雪是白的”的意义(它为真的条件)是:世界上所有的雪都是白的。(如果有一片雪不是,这句话就没有意义。)T 等式的提出标志着哲学家通过语言寻找逻辑体系的夙愿达成,而戴维森(Davidson)则将这一体系导向对自然语言的分析,建立自然语言的逻辑语义学。戴维森以此成为分析哲学和逻辑语义学的集大成者,另一方面又预示着语言哲学研究新时代的到来。

5. 使用论

20 世纪中期,语言哲学家不再试图创造人工语言,构建逻辑体系,而是重点研究交际语境中自然语言的意义问题。这一语用学转向使意义问题从哲学思辨拓展到语言学、文学、符号学等人文学科全域,最终将意义研究锁定为 20 世纪人文学科最为突显的话题。

语用学转向以维特根斯坦的转变标志。他提出了语言游戏说:“我将由语言和行动(指与语言交织在一起的那些行动)所组成的整体叫做语言游戏。”(转自刘龙根 2004:76)语言游戏说表明,不是语言本身,而是语言与其发生环境一起,交织成意义。维特根斯坦由此提出两个重要观点:一是“意义即用法”:语言的意义不是预先给定的,而是由它的具体用法决定;二是“家族相似性”:“我们不是因为现象有一个共同点而用同一个词来称谓,它们通过很多不同的方式具有亲缘关系,由于这些亲缘关系,我们才把它们都称为语言。”(陈嘉映 2003:192)“家族相似性”理论表明,语言范畴的意义不是固定不变的,它可依据各种关联不断延展。维特根斯坦之后,奥斯丁、格赖斯、塞尔等提出言语行为理论,将言说视为行事,在语言形式和交际语境的结合中考察意义问题,并据此提出一系列交际规则。言语行为理论是对意义使用论的具体实践,并由此发展出语言学的新分支——语用学。

6. 解释论

解释论认为:语言的意义不在外界,也不在语言自身,而是来自主体对外在现实的解释。胡塞尔和伽达默尔的观点最有代表性。

胡塞尔认为人的意识活动以意向性为本质特征。意向性即意识指涉(构建、加工、调整、包

含、观照,或仅仅是指向)对象的属性,这种指涉产生的结果就是意义。意义源于主体意识指涉意向对象的赋义过程。(胡塞尔 1998:40)为防止不同主体对意向对象的不同赋义而导致的交际障碍,胡塞尔区分了一般意义和特殊意义。特殊意义在意向赋义中实现,而一般意义则源于“非时间性的、统一的、一致的、观念性或先验的‘内容’,即意义本身”(阳小华 2008:113)。

伽达默尔也赞同解释论:“能理解的存在就是语言”,而一切理解都是解释,“解释潜在地包含于理解过程中”(伽达默尔 1999:13)。对于理解和解释的发生机制,伽达默尔归结为视域融合:“人在理解时必然带着前理解或前见,这种前见是历史赋予理解者或解释者的生产性积极因素,它为理解者或解释者提供特殊的‘视域’。当然,理解者或解释者的各自视域不是固定或封闭的,而是开放的,是理解在时间中进行交往的所在。理解者或解释者就是在视域的这种不断交融中获得一致的理解,扩大自己的视域。”(阳小华 2008:129)

无论是意向赋义还是视域融合,意义的解释论着力于探讨主体意识对意义形成的参与过程和方式,它是目前在人文学科研究中应用最广的一种意义理论。

7.小结

哲学视域中的意义观含混多歧,有时同一学者可以在不同时期甚至同一时期持有几种不同的观点。不过粗略来说,这些观点大致可归为两条主线,一是强调客观性和逻辑性特征的指称论、实证论和真值条件论;二是强调主观性和建构性特征的观念论、使用论和解释论;行为论聚焦主体与环境的互动,同时强调两者。

二、符号学视野中的意义

哲学的语言学转向让意义研究成为焦点,使专职研究意义的学科——符号学应运而生。符号是意义的物质载体。“从本质上讲,不可能有无意义的符号,也不可能有无所指的能指。”(德里达 1999:20)符号学从意义显现的物质条件——符号出发研究意义,它关注符号的构成、意义的构成、符号的指意方式和过程等课题。

1.索绪尔和皮尔斯的符号意义观

符号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问,在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由索绪尔和皮尔斯分别创立。此后整个世纪的符号学,都沿着他们开创的道路展开。

1.1 索绪尔的符号意义观

索绪尔符号学以语言为原型构建。“我们可以设想有一门研究社会中符号生命的科学;它将是社会心理学的一部分,因而也是整个心理学的一部分,我把它叫做符号学。符号学将表明符号由什么构成,受什么规律支配……符号学所发现的规律可以应用于语言学,后者将在浩如烟海的人类学领域中圈出一个界限分明的领域。”(索绪尔 2009:38)

索绪尔将符号分为能指(符号形式)和所指(心理概念),符号是两者构成的双面体,而事物本身被排除在外。“语言是相互依赖的成分构成的系统,在这个系统中,每个成分的价值由同时存在的其他成分决定……内容是在它以外与它同时存在的东西。”(转引自郭鸿 2008:48)在索绪尔看来,使符号发挥作用的不是符号表达的内容,而是系统成员间的关系价值。如此意义被价值取代,沦为结构的功能和结果,成为一个可以被绕过的概念。

1.2 皮尔斯的符号意义观

皮尔斯以数理逻辑的理念建构符号学系统。他认为符号必须具备四个条件:1)再现对象;2)呈现对象的部分特征;3)可被解释成另一个符号;4)符号的顺利运作取决于对象、符号、解释项三者的互动合作,任何一方不能缺席。(黄华新、陈宗明 2016:258-259)符号是由符号(形式)、解释项、对象构成的三元结构。因而符号的意义只有在符号形式与外界对象的结合可以得到解释时才存在。意义即符号形式与指称对象的结合所得到的解释。

20 世纪上半叶,索绪尔范式一统天下,形成了席卷人文研究全域的学术大潮。皮尔斯范式则一度沉寂,直到 60 年代才被重新发现,却迅速与后结构主义-解构主义思潮发生共鸣,替代索绪尔,成为新时期符号学的理论根基。

2.文本符号学的意义观

60 年代以后,符号学迎来了新的飞跃。意义不再被视为单位符号对外界的静态指称(如索绪尔、皮尔斯的讨论),而是在主体创造的文本(承载完整意义的符号序列),甚至文本与文本的相互交织中动态生成。这样的符号学研究被称为文本符号学。法国符号学派和莫斯科-塔尔图符号学派是文本符号学研究的主力。

2.1 法国符号学派的意义观

法国符号学派聚集了一大批著名学者:格雷马斯、列维-斯特劳斯、拉康、罗兰·巴特、德里达……他们将索绪尔的结构主义范式从语言学扩展到文学、宗教、神话、社会学、心理学等人文学科全域,又在扩展中走向了对结构主义的反思,将其导向更为壮观的后结构主义-解构主义思潮。在这样的思想剧变中,文本符号学始终占据着最核心、最显赫的地位。

罗兰·巴特是法国符号学派的中流砥柱,其思想经历了从结构主义向解构主义转变的全过程。结构主义阶段的罗兰·巴特致力于寻找符号背后稳定的意义秩序。(详见殷祯岑、祝克懿 2015)后结构主义的罗兰·巴特则加大了对不稳定意义的探寻。他分析了小说《萨拉辛》,区分了可读性文本和可写性文本;可读性文本只允许读者接受或拒绝既定意义,可写性文本没有既定意义,要求读者参与,帮助建构意义。两种文本没有截然区别,读者不同的阅读态度和方方法可使它们相互转换。稳定意义因而不复存在,文本可同时蕴含多种意义可能。

解构主义的罗兰·巴特将意义的不稳定性阐释得更为彻底。他认为哪怕在同一读者那里,文本的意义也是破碎、流变、没有中心的。因为任何意义都被其他符号近似地表达,能指在指向所指之前,已飘向另一个能指。这就是著名的漂移说:所指一直缺席,有的只是能指与能指的相互替代。文本不断生成、延展,没有固定的意义,只有一片“闪烁的能指星群”。

漂移说已走向了解构主义,而明确提出解构主义思想的是德里达。德里达提出“延异”“播撒”“踪迹”的观点。“延异”即“空间的分裂”和“时间的延迟”,词语没有固定的意义,只有在使用中不断与他者相区别的用法。这些用法彼此平等,不断演变,词语在使用中留下的就不再是确定的义项,而是踪迹。踪迹不断地产生和消除,在语义网中四处播撒。德里达在此充分阐明:意义除了在文本使用中在线生成,没有任何其他的实现途径。

综上,法国符号学派认为,意义不由语言符号预先给定,而是需要在文本实践中在线完成。文本的意义具有强烈的主体建构性、文本生成性、不稳定性和动态流变性特征。

2.2 莫斯科-塔尔图学派的意义观

前苏联的莫斯科-塔尔图学派将世界分为自然语言、人工语言、文化三个部分。他们将文

化锁定为研究的目标,而“文化是一个有组织的领域,其基本单位是文本,文本是功能和意义的载体,文化就是文本的综合”(陈勇 2010:65)。这样,他们以文本原则取代符号原则,试图通过研究文本的意义把握文化。

莫斯科-塔尔图学派的功绩主要在对文本进行功能分类和打通文学、日常语言的研究壁垒上。在文本分类方面,其代表人物洛特曼认为,文本包括结构和功能两个方面,因此决定文本类型的就不能只是形式标准,还要考虑其社会功能,如可从信息发出者和接受者的角度对文本分类。从接受者角度看,文本解读有三种方式:1)以发话者意义为准则的阅读;2)以接受者的意义框架解释文本的阅读;3)寻求发话者意义与接受者意义框架契合的阅读。(李幼蒸 2007:636)三种方式带来文本意义和功能分化,以此可设立三种文本类型。

在文学语言和日常语言的关系上,以往研究多从语音、语汇、语法的视角出发,将两者归于不同的语言系统分别研究。这显然与常识有违。莫斯科-塔尔图学派试图弥合两者,设计可同时用于文学和日常语言的分析方法。他们找到“表述”作为其共同的单位,使得“文学研究进入篇章语言学的问题之列”(陈勇 2010:65)。通过对表述和文本功能的强调,莫斯科-塔尔图学派也将研究对象导向了文本。在意义观上,他们以解释论为向导,强调意义的相对性和变化性,同时对意义产生的动力问题进行思索。

3.一般符号学的意义观

一般符号学继承和发展皮尔斯范式,旨在探寻一切符号(包括语言符号、人类社会的其他符号、动物符号、有机体符号等)运行及指意的规律,构建适合所有符号现象(包括社会现象和部分生物现象)的理论体系。代表人物有莫里斯、艾柯和西比奥克。

莫里斯(Morris)认为一切科学都可视为特定对象的符号解释,都是特定领域的符号学,因此符号学具有将所有学科统一起来的元科学功能。根据皮尔斯的三元结构论,莫里斯将符号学分为语形学(研究符号间的关系)、语义学(研究符号与对象的关系)和语用学(研究符号与解释者的关系)。在语用学中,他将符号的指意分为:1)感觉阶段,指意是指称性的,产生的意义是得到信息;2)操作阶段,指意是评价性的,产生的意义是对对象的评价和选择;3)完成阶段,指意是规定性的,产生的意义是实施特定行为。(郭鸿 2008:66)这三阶段可区分符号指意的三种方式和三种意义类型,莫里斯以此对符号的意义进行了解剖。

艾柯(Eco)以建构普遍符号学的理论体系为目标。他说:“能在意义上代替别的事物的就是符号……符号学原则上研究一切可以用来撒谎的东西。”(艾柯 1990:5)作为百科全书式的学者,艾柯的思想包罗万象。对意义研究而言,最值得关注的是他的符号生产理论和对“解释项”的发展。符号生产理论强调符号意指只在交际过程中才有可能。符号的结构和功能,形式和内容都与交际的符号化过程有关。此外,艾柯将皮尔斯的解释项具体阐释为:1)同一符号系统中的同义词;2)另一符号系统中的同义词;3)对外物的指称;4)由符号引申的情绪联想;5)认知该符号获得的行为习惯。(黄华新、陈宗明 2016:256)通过对解释项的详细阐释,艾柯继承皮尔斯的思想,也对意义进行了解剖。

西比奥克(Sebeok)是 20 世纪最负盛名的一般符号学家之一。他的特色在于从生物学角度构建符号学理论。西比奥克认为所有动物都从遗传得到使用和制造符号的能力,它是一切生命存在的基本条件。这样,一切自然和社会现象都可纳入符号学。西比奥克由此将符号学扩展至非语言符号学和动物行为符号学,大大超越了之前的疆域。就意义观而言,西比奥克提出建

模系统,认为“模型建构是生物以特有的方式对世界进行动态认知、创造和改造的符号活动。”语言的“原初功能应是建模,即构建主体内外环境的认知模型;并非交流,因为后者完全可以通过历史更为悠久的非语言方式进行。”在建模观下,意义是主体建构的内在认知模型,“意义的生成就是内在模型中动态的主体性符号活动过程。”(参见黄华新、陈宗明 2016:256)

4.小结

皮尔斯范式影响下的文本符号学和一般符号学强调意义的主体解释性、在线生成性、过程性、流变性特征。此外,由于以符号为切入点,皮尔斯、莫里斯和艾柯都实现了对意义的解剖和分类。与此相对,索绪尔则采取一种独特的代数式路径,规避意义问题,从形式和形式关系的角度探讨符号的运行规则,书写了 20 世纪上半叶语言研究的传奇。

三、语言学视野中的意义

20 世纪初,现代语言学在索绪尔范式下展开,它首次提出要揭示语言运作的本质和规律,采取的却是抽象化、同一化的结构主义方法。结构主义语言学发展出稳定、系统、可操作的分析框架,将语言学推上人文学科的最前沿。但是,它对意义的态度却是悲观的。直到 60 年代,关注意义的语言学分支才在功能主义的大旗下走上前台。

1.形式主义语言学的意义观

索绪尔之后,关注形式结构,排斥意义功能的形式主义语言学成为语言研究的主流。哥本哈根学派、美国描写语言学和转换生成语言学代表了这一成就。

哥本哈根学派的叶尔姆斯列夫(Hjelmslev)将索绪尔“语言是形式,不是实质”的观念彻底化。他将能指与所指发展为表达平面和内容平面,两者又分别由形式和实质构成。其中,表达-形式(语言系统)和内容-形式(概念系统)是符号的组成部分,它们的相互依存及符号与其他符号的相互依存是符号系统成立的条件;而表达-实质(语音的生物潜能)和内容-实质(语言外事实)——语言符号与外界事实的关联——则被排除在符号之外。

以布龙菲尔德和哈里斯为代表的美国描写语言学派,用分布原则和替换方法精密描写语言的形式系统,开创了卓有成效的语言分析路径。但这一路径同样规避了意义,因为意义太过复杂,考虑意义会带来语言分析的不确定性。但是,布龙菲尔德们并非认为意义不重要,他们只是找不到合适的分析方法。正如布龙菲尔德所说:“在语言研究中对意义的说明是一个薄弱环节”(布隆菲尔德 2009:167)。“令人痛心的是现在有这样一种说法,即我,甚至包括我在内的一群语言研究者,都不注意或否定意义,甚至说我们打算不要意义来研究语言……假如让这样一种说法流传下去,将会损害语言学的进展。”(转自徐志民 2005:251)

乔姆斯基的转换生成语言学将形式主义的句法分析推向顶峰,它致力于解释人类的语言能力,描述语言直觉中由少数语法规则生成大量语句的原理。它最初完全排斥意义,认为语法独立地对语言生成起作用,语法清晰意义自然明了。但由于分析中生成了大量如“绿色的思想在愤怒地睡觉”这样的语句,到第二阶段,乔姆斯基提出深层结构和表层结构概念,认为语义在深层结构中发挥作用,参与语言生成。到第三阶段,不仅深层结构,表层结构也与语义密切相关。而到管约论,意义的地位得到明确:“我们希望研究出一套内结构高度严谨的普遍语法

理论,它以一系列基本原则为基础,这些原则明确划定语法的可能范围,并严格地限定其形式,但也应该包含一些参数,这些参数只能由经验决定。”(阳小华 2008:76)

转换生成语言学一面发展,一面经历着内部的分化和外部的挑战,这些挑战集中在对语义的处理上,最终带来了一系列功能语言学派的兴起。可以说,转换生成语言学的发展、分化和新兴学科在蜕变中的崛起,昭示着主流语言学界高扬形式、回避意义的研究态度的终结。

2.功能主义语言学的意义观

功能主义语言学是注重从语义实现和交际功能角度解释语言结构和现象的理论和分支。它们在对转换生成语言学的质疑和挑战中兴起,将语言学导向意义研究的新高度。

2.1 转换生成语言学的功能主义分支

60年代起,转换生成语言学内部不断出现质疑的声音,要求提高语义在句法研究中的地位,在形式主义的巅峰,孕育出一条条功能研究的路径。格语法和生成语义学影响最大。

格语法由乔姆斯基的学生菲尔墨提出,是最早从内部修正转换生成语法的理论。菲尔墨认为,在句法规则外,句子还受语义规则制约,如动词和名词之间应增加语义限制,才能保证不会生成“饭吃人”这样的句子。“格”,就是不一定以显性标记呈现,却一定存在的动、名之间的语义关系,如施事格、受事格、工具格等。这些格关系“一旦确立就固定不变,不管怎么转换操作,在表层结构中处于什么位置,与动词形成什么语法关系。”(封宗信 2006:187)菲尔墨以此修正了转换生成语法的分析模式,对语言研究观念的转向具有重要价值。

其后,乔姆斯基的学生和同事罗斯、麦考利、莱考夫等发展出生成语义学理论。生成语义学对转换生成语法(标准理论)的改进主要在两个方面:1)不再区分深层结构和语义结构,深层结构就是语义结构;2)不仅语法,语义也有生成性,全程参与语言生成,并在转换中逐步实现。生成语义学以此走上以语义为核心的研究道路,他们不断削减句法范畴,使其最终与逻辑范畴一致,同时大量纳入与理解有关的外部因素。到70年代,他们已考虑到交际主体的社会关系、语言社团的文化背景、会话含义等问题,实现了研究理念的蜕变。

2.2 认知语言学

格语法和生成语义学都是从内部修正转换生成语言学的典范。70年代中期,莱考夫、兰盖克等人直接放弃了生成语法,转而关注语言与认知的关系,在对语言意义的思考中越行越远。“认知语言学不是一种单一的理论,而是代表一种研究范式。”(沈家煊 2002)它认为语言能力是人类一般认知能力的一部分,对它的研究必须参照人类普遍的认知方式和认知过程。因而认知语言学以认知规律和身体体验为基础,对语言的结构、意义和功能进行解释。目前,美国的圣地亚哥学派和伯克利学派是认知语言学研究的主力。

圣地亚哥学派以兰盖克的认知语法研究为代表。它认为句法并不自足,是人类普遍的认知方式在句法层面的显现。句法范畴是语义象征化(形式表征意义)的结果,如名词是对实体的象征,动词是对运动状态的象征等;句法结构则是认知影响下,语言单位的用法模型。从有限的认知原则出发,我们就可统观各种复杂的语法现象,实现以简驭繁的解释目的。

伯克利学派以莱考夫、菲尔墨等人的认知语义学著称。他们也认为语言的意义扎根于人的身体经验,语义结构是概念化过程的结果,它不仅反映外界现实,更反映人们基于体验对现实进行主观解释和结构化的方式。如此人们藉以结构经验、形成范畴的认知方式、意象图式、范畴化过程、概念整合等问题就成为语言研究的核心。

认知语言学通过强调身体经验在语言运作中的重要价值,明确主张以主体认知过程为原则的语言研究。它以对具体语言现象的强大解释力声援了语言意义的主体解释观,使语言学真正突破形式壁垒,融入对功能、意义的探讨之中。

2.3 布拉格学派和俄罗斯功能语法研究

俄罗斯素有深厚的功能主义传统,这一传统与结构主义理念结合,诞生了传承百年,兼顾结构和功能两种研究取向的布拉格学派,为语言学的发展贡献了独特力量。

布拉格学派把语言看作由多种表达手段构成的为一定交际目的服务的功能系统,在功能视域中研究语言的结构是他们的最大特点。其代表人物有马泰修斯、特鲁别茨柯依、雅各布森等。马泰修斯研究言语交际的编码过程。他将编码分为语言对外界经验的命名和对命名的组合两个步骤,研究不同句子在上述过程中的抒情和交际功能,着重分析了主述位,语气、时态等问题,代表了布拉格学派的重要成就。特鲁别茨柯依(Trubeczkoy)在音位学上成就突出,他提出“区别性特征”,并对音位学理论作了系统全面的阐发。雅各布森最负盛名。他将对立概念从音位学扩展到词汇句法层面,提出语言系统中一些成分(或句法组织)比另一些更自然,称为无标记成分,如 He came to London in 1930,与此相对的是有标记成分,如 It is 1930 that he came to London.(朱永生等 2004:11)有标记成分是因主体要传达特殊的意义而存在,具有特殊的语义功能。此外,雅各布森格外强调文学语言的研究,希望将文学语言和自然语言置于同一理论框架下思索,这也是他基于意义和功能的研究观念的体现。

布拉格学派发现了许多极有价值的语言学课题,就连转换生成语言学也对他们多有借鉴。也因此,俄罗斯语言学一早就走上了重视意义的研究道路,其功能语法研究最为醒目:

邦达尔科(Бондарко)一反传统,以语义范畴为基础研究各种语言表达手段。他将语义功能相同的语言形式聚集在一起,归并为多个子系统,研究系统的内部结构、相互关系和语义功能的实现方法。“对他来说,不存在形态学、词汇学、句法学甚至篇章语言学的界限,只要属于同一个语义范畴,都可以放在一个集合中进行研究。”(于鑫 2005)

左洛托娃(Золотова)倡导交际语法。她将功能分为系统功能和交际功能。“系统功能指语言单位构造句子的能力,包括它们独立使用、充当句子成分和充当词组成分的能力;交际功能指语言表达说话人思想和意图的功能,如陈述、祈使、感叹等等。”(于鑫 2005)传统语法只研究系统功能,而左洛托娃希望加强交际功能的研究。她关注“交际类型句”,区分了再现句、信息句、意愿句、反应句、抽象句五种类型,每种句子通过一定的句法手段实现,它们相互作用,产生各种篇章效果,实现交际目的。在左洛托娃那里,语法、篇章、语义、语用的边界同样不再清晰,它们以语义功能为纽带,联系成一体。

在俄罗斯功能语言学中,意义代替形态,成为研究的中心,语言的意义就是语言在语篇中实现的抒情表意、交流信息的功能。但由于研究视点的限制,他们对语义功能的实现过程、机制、参与因素等问题并未着重讨论。

2.4 伦敦学派 - 系统功能语言学派

伦敦学派的代表人物有马林洛夫斯基和弗斯,而最终使其发展壮大的,是弗斯的学生韩礼德。伦敦学派从社会功能的角度研究语言意义,尤其重视语境的价值。马林洛夫斯基将语言看做一种社会行为模式,认为“孤立的词不过是臆造的语言事实……真正的语言事实是在实际语境中的完整话语。”(转引自刘润清 2004:217)他将研究对象确定为语境中的话语,而意义就来自话语与其发生语境的关系。弗斯也研究语境中的话语意义。他提出“典型情境语境”,即

“人在特定场合下遇到的环境,它决定人们必须扮演的社会角色”(刘润清 2004:211)。典型情境和社会角色都是有限的,因此言语并不混乱,而是具有一定的程式:“一旦有人向你说话,你就基本处于一种规定好了的环境,你再也不能想说什么就说什么。于是,语义学就成了对出现在典型情境语境中的话语进行分类的问题。”(封宗信 2006:44-45)

韩礼德继承了弗斯的语境论和系统观,构建起体系周延的系统功能语言学理论。系统功能语言学致力于设计语言意义的分析框架,主要内容有:1)功能理论:语言的意义是语言在交际活动中实现的社会功能,包括概念功能、人际功能和语篇功能三种;2)系统理论:语言的功能由系统中的成分及相互关系实现,系统是功能潜势的集合。意义是从系统中选择功能手段,组合成语篇,在语境中具体使用的结果;3)语境和语域:语境可分为语场(话语的主题、内容)、语旨(交际者的关系和交际状态)、语式(交际发生的方式、媒介等)。它们影响三大元功能的实现,而语域即不同语境下语言的功能变体。如此,系统功能语言学建立了语言形式(系统)、意义(功能)、社会语境的连结,实现了对语言意义的系统分析。

系统功能语言学明确提出建构语言意义的分析方法。它坚持在语境制导下分析自然语篇的意义功能,以其系统性和可操作性得到学界的广泛认同。但就连韩礼德本人也认为意义的分析框架尚未妥善建立,这大概是因为:1)它仅从社会功能角度观照意义,缺失了心理维度的意义分析;2)它沿用语法单位(小句)进行意义分析,而语法小句是否适合意义分析还值得商榷;3)不少缺乏形式标记的意义问题(如意义的自动浮现)在理论中没有得到解释和重视。

2.5 语用学

语言学的语用学从哲学语用学发展而来。以思辨为特色的哲学语用学在探讨日常语言的意义问题时提出了诸多会话规则,对强调语境、意义和社会功能的功能语言学产生了很大影响。80年代后,注重语言材料的分析、解释的语用学在语言学中生根发芽。

与哲学思辨相比,语言学的语用研究更关注语用规则和环境因素对语用策略的影响,探讨会话现象背后的语用机制和交际过程是研究的目的所在。会话含义、会话原则、话语过程、预设、言语行为、会话结构等是其研究的核心。在这样的研究中,语言意义的在线生成性、环境规约性、主体解释性特征再度得到强调,与当代学术语境中的意义研究形成共鸣。

3.小结

20世纪上半期,主流语言学回避意义;功能主义兴起后,语言学从社会和心理两个方面观照意义问题,对意义的主体建构性、语篇生成性、环境规约性的日益强调,与当代学术大潮渐趋统一。语言学从理念上明确了意义是语言研究的核心和本体,(如Harris曾断言:“语言很清楚是,而且首先是,意义的载体”(转引自姜望琪 2007),但可操作的意义分析方案尚未妥善制定。不过,近几十年出现的不少理论方法,如认知语言学、系统功能语言学、功能语法等都在极力探寻适合语言意义的分析路径,甚至开始关注一些具有核心价值的意义问题(如浮现意义的实现),寻找语言学突破性发展的契机。

四、语篇意义的分析单位

我们生活于意义中,无法对它进行本质直观,因而我们对意义的理解注定无法像对自然界那样清晰完整。所能做的,只是从各个方面综述前人的思考,汇成一幅尽可能全面、重点突

出的意义图景。本文综述了哲学、符号学、语言学研究中的意义观,我们发现:

1)哲学视野的意义观大致可分为两种:一种强调语言与外界的客观对应;一种强调主体对意义的主观建构。近几十年来,主观的意义观成为主流。

2)符号学家从符号与意义的关系切入,对意义的内容进行解剖。他们关注自然的符号序列——语篇,而非符号单位的意义,尤为强调语篇意义的在线生成性、主体建构性、环境规约性和流变性特征。

3)20世纪上半期,主流语言学规避意义;60年代后,语言的意义从功能(社会和心理两个方面)的角度得到重视,其语篇生成性、主体建构性、环境规约性也得到强调。

可见,在当代学术语境中,语言的意义强调具体语境中的语篇意义及其社会、心理功能。它包含客观事件和主观评价两方面内容,且在主体认知和环境规约下形成。赵毅衡(2016:99)列举了一批学者关于意义的思考:

皮尔斯:对象(object)-解释项(interpretant)

瑞恰兹:指称(referent)-指称的思想(thought of reference)

本维尼斯特:字面的(literal)-语境的(contextual)

叶尔姆斯列夫:外延(denotation)-内涵(connotation)

莫里斯:指向(denotatum)-意味(significatum)

卡尔纳普:外包(extension)-内包(intension)

雅各布森:指称(referent)-意味(significance)

巴特:意义(meaning)-神话(myth)

艾柯:词典式解码(dictionary)-百科式解码(encyclopedia)

赫许:含义(sinn)-意义(bedeutung)

虽名称各异,但学者们均赞同将意义划分为客观事件和主观评价两个方面。客观事件包括客观对象(皮尔斯的对象、瑞恰兹和雅各布森的指称、叶尔姆斯列夫的外延)和述谓性事件(巴特的意义、艾特的词典式解码、赫许的含义);主观评价包括理性的评价和阐释(皮尔斯的解释项、瑞恰兹的指称的思想、艾柯的百科式解码);感性的体验和情感(莫里斯和雅各布森的意味)及主体意向(本维尼斯特的语境意义、赫许的意义、叶尔姆斯列夫的内涵)。

至此我们可以说:意义的内容包括事件(对象和述谓性事件)和评价(理性阐释和评价、感性体验和情感、主体意向)两方面内容,只有当语言形式同时表征了事件及相应的评价信息时,它承载的意义才是完整的。同时,论域内的语言意义具有主观建构性、环境规约性、在线生成性、发展流变性的特征。^①本文将自然语篇中承载了完整意义内容(事件+相应评价)的符号形式设立为语言意义的分析单位。

主流意义观期待我们从语篇视角研究语言意义。事实上,许多功能派学者也早已走上了语篇分析的道路,语篇整体意义的生成机制和过程成为一个日趋重要的研究课题。(关于语篇分析的发展历程和范式方法可参见陈平 2012、2017;祝克懿 2010;丁金国 2014;吴思如 2017等)然而要对语篇进行意义分析,首先要将自然延展的语篇切分成一个个边界明晰的单位,才能考察其整合组配规律和主体、环境对意义的建构规约。以往的语篇分析多以语法单位(如小句)充任意义分析单位。我们认为,语法单位并不能完全胜任语篇的意义分析。如:

(1)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马致远《天净沙·秋思》)

上例语篇具有整体性的语篇意义。我们若以小句(最小的具有表述性和独立性的语法单位)为意义的分析单位,则面临两个问题:1)语篇中以“,”“。”隔开的符号序列是不是具有表述性的小句?2)若是,小句“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分别用名词并置了三个意象,每个名词都表征了独立的事件信息和评价潜势(关于“评价潜势”请参考殷祯岑 2016),且彼此之间并未表现出语义上的亲疏差别。显然,这 9 个名词不是以小句为单位联合表意的,它们彼此独立,单独承载完整的意义内容。再如:

(2)a 他不表态,让我深感不安。/ b 他不表态,我深感不安。

主谓结构“他不表态”在 a 句中作整句的主语,不能视为小句,而在 b 中则是典型的小句。从意义分析的角度看,a 句和 b 句都承载了两个事件([他不表态]和[我深感不安]),应当视为两个表义单元,先分别考察,然后再讨论其间的语义关系。而若以小句为单位,则 a 句只是一个表义单元,与实际情况不符。

可见,语法单位小句并不能完全胜任语篇意义的分析。语篇的意义分析还需立足于意义概念设置自己的切分单位。唯有如此,我们的分析才能切合语言实际,具有解释力。^②

五、结语

致力于意义研究的功能语言学已走过几十年的研究历程,但语言意义的分析方法至今未能系统地确立。意义概念混沌不清是一个重要原因。为此,本文从多学科视角梳理学术语境中的意义观,并以此为基础提取意义概念,作为语言学意义分析单位的设置理据。

当代学术语境倾向于在自然语篇中研究语言意义,强调整体性的语篇意义具有在线生成性、主观建构性、环境规约性、发展流变性特征。由此,从语篇视角切入,展开意义生成的过程、机制分析是一条大有可为的研究路径。而这一路径的开辟首先需要设定适合意义分析的语篇单位。本文以学术视野中的意义概念为依据,认为语篇中能承载完整意义(事件+评价)的符号序列即为语篇意义的分析单位。

注 释

①本部分内容在殷祯岑(2016)中也有讨论。

②切分出语篇的意义单位之后,如何建构框架,切实分析语篇意义的整合生成,殷祯岑(2016)已作粗略探讨。限于篇幅,不再赘言。

参考文献

- 艾 柯 1990 《符号学理论》,卢德平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布龙菲尔德 1980 《语言论》,商务印书馆。
陈嘉映 2003 《语言哲学》,北京大学出版社。
陈 平 2012 话语分析与语义研究,《当代修辞学》第 4 期。
陈 平 2017 话语的结构与意义与话语分析的应用,《当代修辞学》第 2 期。
陈 勇 2010 《篇章符号学:理论与方法》,黑龙江大学出版社。
德里达 1999 《声音与现象:胡塞尔现象学中的符号问题导论》,杜小珍译,商务印书馆。
丁金国 2014 语篇特征探析,《当代修辞学》第 1 期。
封宗信 2006 《现代语言学流派概论》,北京大学出版社。
郭 鸿 2008 《现代西方符号学纲要》,复旦大学出版社。

- 格雷马斯 2001 《结构语义学》,蒋子骅译,百花文艺出版社。
- 洪 谦 1982 《逻辑经验主义》,商务印书馆。
- 胡塞尔 1998 《逻辑研究(第二卷)》,倪良康译,上海译文出版社。
- 黄华新、陈宗明 2016 《符号学导论》,东方出版中心。
- 伽达默尔 1999 《真理与方法(第一卷)》,洪汉鼎译,上海译文出版社。
- 姜望琪 2007 从句子语法到篇章语法,《中国外语》第 5 期。
- 李幼蒸 2007 《理论符号学导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利 奇 1978 《语义学》,李瑞华等译,上海教育出版社。
- 刘龙根 2004 《意义底蕴的哲学追问》,吉林大学出版社。
- 刘润清 2004 《西方语言学流派》,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 洛 克 1959 《人类理解论》,关文运译,商务印书馆。
- 沈家煊 2002 序,束定芳《语言的认知研究》,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 索绪尔 2001 《普通语言学教程》,商务印书馆。
- 吴思如 2017 俄语语篇修辞学的形成与发展,《当代修辞学》第 3 期。
- 徐志民 2005 《欧美语言学简史》,学林出版社。
- 阳小华 2008 《语言·意义·生活世界》,知识产权出版社。
- 殷祯岑、祝克懿 2015 克里斯蒂娃学术思想的发展流变,《福建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第 4 期。
- 殷祯岑 2016 语篇意义的自组织生成——耗散结构理论观照下的互文语篇分析,《当代修辞学》第 5 期。又见“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语言文字学》2016 年第 12 期。
- 于 鑫 2005 当代俄罗斯的功能语法流派,《中国俄语教学》第 2 期。
- 赵毅衡 2016 《符号学原理与推演》,南京大学出版社。
- 张妮妮 2008 《意义、解释和真:戴维森语言哲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朱永生、严世清 2001 《系统功能语言学多维思考》,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 朱永生、严世清、苗兴伟 2004 《功能语言学导论》,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 祝克懿 2010 互文:语篇研究的新论域,《当代修辞学》第 5 期。
- Ryle, G. 1963 Theory of meaning, In C. E. Caton eds. *Philosophy and Ordinary Language*, The University of Minois Press.

The Meaning of Meaning : On Analytic Unit of Text Meaning Yin Zhencen

Abstract: The study of meaning urgently needs promotion and expansion. However, the concept of meaning is obscure at present. We tease out the views of meaning from the subjects of philosophy, semiotics and linguistics to describe a picture of concept of meaning. It is found that contemporary academia tends to study the meaning of languag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ext linguistics. Meaning of a text includes objective events and subjective evaluations. Only if the sequence of signs represents both at the same time, the meaning is complete. Accordingly, the study of meaning from the angle of text linguistics is promising. In consideration of the importance of analytic unit setting, we suggest that sequence of signs, which represents complete meaning, is the analytic unit in text meaning study.

Key Words: meaning of language, objective event, subjective evaluation, sequence of signs, text meaning, analytic unit of text meaning